

论 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天津的犯罪小团伙 ——以《益世报》为视角

王宜林^{a b}

(安徽师范大学 a 社会学院; b 附属外国语学校,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 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 天津处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之下, 频繁的行政区划更迭和多方势力在天津的角逐, 华洋杂处铸就的市民性格特征成为天津犯罪小团伙滋生的社会背景; 当时天津犯罪小团伙数目较多, 有十大恶、玫瑰党、摩登破坏团等, 其作案动机、手段各异; 天津犯罪小团伙的活动与作案目标、与其他社会势力和文化风俗的冲突都有关系。

关键词: 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 天津; 犯罪小团伙

民国时期政局动荡、社会不宁, 特别是那些大城市中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 导致了中国的行政司法的不完整, 各种犯罪团伙在各种势力的缝隙中觅得生存的空间。然而, 对民国时期城市中的犯罪团伙的研究仍尚薄弱, 且仅有的几部著作都集中在对上海的研究上, 如苏智良、陈丽菲著《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郭旭印著《旧上海黑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相关其他城市犯罪问题的研究尚未发现有论文发表及专著的出版, 天津亦是如此。

一 天津犯罪小团伙滋生的社会背景

1928 年国民政府接管天津后, 天津被改为天津特别市。但“天津特别市区划仍沿旧制, 将东、西、南、北、中五个区的名称改为公安一、二、三、四、五区, 另有三个特别区(即原德、奥、俄租界)、四乡区, 还有英、法、日、意、比五国租界。1930 年 6 月改天津市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管辖。1930 年 11 月, 河北省省会又由北平迁来天津, 乃改天津为省辖市。1931 年 1 月收回比租界, 增设特别第四区, 行政事务归特三区署兼管。1934 年 1 月, 市、县创界, 乡区归天津县领导。1935 年 6 月, 省会迁往保定, 天津再改为特别市, 归行政院管辖。”^{[1] 304} 一个地区市政区划的变更频率之快、内部行政主体之琳琅满目堪称当时全国之冠。如此频繁地更迭行政区划和多方势力在天津的角逐, 为犯罪团伙在各种势力的缝隙

中生存提供了可乘之机。

“天津作为一个城市, 是伴随着天津冲积平原逐渐形成而发展起来的, 而且城市形成的主要因素是河、海漕运和商贸活动。”^[2] 天津的地理特点使得它成为转运粮食、商品的水旱码头, 再加上天津在近代经济的不断繁荣扩大了天津对外地人的吸引力, 天津也是近代中国主要由移民构成的移民城市之一。在这所移民城市中有从西方来的暴富“冒险家”、也有从前清、北洋官场失意携带万贯家财匿居于此的寓公, 更有许多终日劳作的脚行、搬运工和西餐露宿的乞丐, 城市居民的贫富分化极为严重。一方面“随着各国租界的开辟, 巨额财富不断流入那些入侵者和前来天津‘淘金’的西方‘冒险家’腰包, 这些人暴敛致富后, 便在租界地恣意寻欢, 尽情享受, 过着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的糜烂生活。”^{[3] 403} 另一方面“沿海一带的‘灶户’雇用的‘灶丁’生活更为悲惨, 他们除了按季给灶户刀、滩晒盐, 担负着沉重的劳动外, 工余还要为灶户做家务。食不果腹, 衣不蔽体, 如同牛马一般。”^{[1] 472} 真可谓“富者资产躬万, 炊金爨玉, 一饭千金, 重茵叠褥, 一衣万金; 居则深宅大院, 洋楼广厦, 行则汽车飞驰, 用以代步……辛苦劳工, 贫穷小贩, 终朝竭尽全力, 而劳苦之结果, 所入亟微, 甚至数米为炊, 称薪而爨, 衣难蔽体, 食难一饱, 居求一贫民之窟而不可得。”^{[1] 472} 巨大的贫富差距加剧了天津社会的动荡。一方面为了满足暴富者纸醉

*收稿日期: 2008-09-08

作者简介: 王宜林, 男, 安徽庐江人, 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育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历史学科教学。

金迷、声色犬马的糜烂生活,“天津社会上腐朽、丑恶的社会渣滓也在租界当局的包庇和利用之下继续存在和发展起来,租界地成了毒、赌、嫖、骗的渊藪。”^{[3] 403}另一方面“一些无业游民因为谋生不易,于是铤而走险,流为盗贼,市区内,‘黑白线’及‘小缮’、‘扒手’出入无常,在四郊没野,绑票勒赎,杀人越货时有所闻。”^{[1] 472}

华洋杂处、贫富共生的状况也铸就天津这所移民城市的居民许多独特的性格特征。首先,“津人气刚好胜,率因片语龃龉致肇争端者,赋稟然也”,^{[4] 112}甚至有人认为天津人好打架,“原因可大可小,大到争房子争地,小到没有任何原因。”^{[5] 27}其次,研究者也承认天津人性格中也融入了一些混混儿的坏习气,“混混在天津人口中只占极少数,混混的行为不能代表天津人的行为,混混的性格也不能代表天津人的性格。但是沿袭下来的坏习气却已融进了民国时期天津人的性格中。”^[6]再次,天津人好赶时髦,“因为天津水陆交通发达,南通江南,北连关外,而且,外通东洋、西洋,那时候,时髦的东西一定要先在天津兴起来,然后才会传到北京去”。而且“上海距离天津远,上海再时髦,也渗透不到天津来。所以尽管天津不如上海时髦,但那时候的天津人却不肯学上海,天津人以为自己才最时髦。”^{[5] 34}追逐时髦使得天津“社会风俗呈现出良莠相杂、中西兼有、传统与现代并存的格局。”^[7]

天津市民的性格特征使得犯罪活动容易滋生,新旧社会风俗在天津的交织往往也会成为社会冲突的诱因。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天津与其距离不远更为一些不法之徒的犯罪活动提供了便利。

总而言之,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天津独特的社会环境为犯罪团伙这株毒草的滋生提供了肥厚的土壤。

二 天津犯罪小团伙概况

天津《益世报》(1915—1949)是民国时期罗马天主教会在中国印行的中文日报,存世时间前后达三十余年,是中国近现代颇著声名的全国性重要报纸之一,与《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一起,被人们并称为旧中国“四大报”。《益世报》虽有宗教背景,但并非传教性报纸,与《申报》《大公报》等一样,是一种内容相当丰富的社会公共性报纸。它的内容包罗万象,信息含量大,资料价值高,充分向人们展示了近代华北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由于其总部设于天津,天津的社会风土人情能够迅速为其捕捉。

在当时天津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下,活跃于天津

的犯罪小团伙数目较多,其作案动机、手段各异。本文拟就见诸《益世报》版面的十大恶、玫瑰党、摩登破坏团三类犯罪小团伙,管窥当时津门犯罪小团伙的一般情况。

十大恶。这是一种作案手段多端,行为较为诡秘的团伙。《益世报》有数篇报道受其名称误导,误以为十大恶就是由十个大恶人组成的一个团伙,其实不然。此名应是从中国古代刑法中不可赦免的十种重大罪名(即所谓“十恶不赦”)引申出来的。十大恶是天津、河北一带对某种犯罪团伙的俗称,而非一个由十人组成的团伙,《益世报》1934 年一篇报道称“河北大红桥胜芳码头一带,素有一种盗匪,俗名十大恶”。^[8]该团伙有如下特征:(1)各股十大恶团伙各自行动,都有自己的首领,相互并无联系。如 1929 年 2 月勒索天津船业商分会船只的十大恶首领为姚瞎子,1930 年 5 月在天津特别二区强索粮食被抓的十大恶“供出尚有同伙大李等四人,为该伙首领。”^[9]1934 年在河北邵家园子被抓的十大恶头目则是董长江。(2)犯罪手段多样。十大恶大多在水路或陆路交通便利的地方活动,以打劫车船为能事,但是方法各异。如姚瞎子一伙“到会员(天津市船业商分会)船上声言,系省船会(河北省船会)人员,不许入市船会(天津市船会),如违,人船生亡,当可实现。”^[10]也有十大恶“假托名义,组织会社,阳籍保护之名,阴行需索之实。”^[11]而大李团伙则手段更为多样,他们劫车时“有用言语强索者,有动手割刺者,有运输者,有寻风者,有预备厮打者,此专对脚行运粮时而言。若柴车,则每过一辆,须给伊等大铜元十枚,不然则任意抽搬,一如粮车经过然。见普通过客之行李包裹,则直前取携,一经拦阻,则伪称脚行,其实客人稍一疏忽,伊等即携物转弯潜逃矣。”^[12](3)组织严密。“倘不幸被官府抓获,则涉讼者之衣食用度,并家小所需,皆由伊等均摊。”^[12]这样被捕者便能后顾之忧,给官府深究其他人带来困难。

玫瑰党。这是一个专门诱骗青年男女钱财流氓团伙,以法租界华中路白玫瑰理发所为其秘密机关。其组织严密,“党员男女均有专以诱惑气血不定之青年为能事,有党规有组织,以长筒反皮手套为标记,定有党规多条,书于皮手套内。其第一条,即不准与对方发生真诚爱情,违者按党规予严厉处罚。”^[13]受骗者轻则损失钱财,甚至有被卖入妓馆生不如死者。如该党党徒陈昭铭,先是衣饰阔绰,装成大学生模样,出手大方,获得一女青睐。日子一久,

便告手中拮据,由女慨然供给。再后来女方亦手空空,“陈忽饰词有挚友现在伪国,数函见召,势必须往,并邀女同往,女欣然从之,以图永聚。”^[13]然而,抵达沈阳后,陈即托词逃走,以价洋三百元将女变卖为娼。

摩登破坏团。与上两个团伙不同,摩登破坏团并不以强夺、诈取他人钱财为主要目的。该团常常潜伏在各电影院旁,“将破坏衣服之药水,洒于座位上者,有于散场时承人拥挤之际,实施破坏者。”^[14]被害者多为“装束摩登之青年男女”,数日之内“有百余人受害”。^[15]该团甚至公然张贴布告,宣示自己的主张,但也有助于外界了解该团伙的作案动机:“本团工作以来,被本团警告者约有数十人,但外间多有不明本团宗旨者。兹报告国人,本团所破坏者分五项:一、奇装异服之男子,如着红绿色西服者,或着高领窄袖红绿里之中国长衫者,本团必破坏之。二、服装不齐整者,如男女不扣领扣等青年,本团必破坏之。三、终日追逐女性类似拆白之无赖男子,本团必与之周旋。四、服装奇异特别有诱惑性之女子,如不着袜子、不穿长裤,故意以曲线示人者,本团必以强水毁其一切。五、服用外货之男子更无足论。”^[15]终因其行动过于猖獗而为法租界工部局侦破。从摩登破坏团五项主张来看,其对外国事物的排斥与义和团有异曲同工之妙,反映了天津市内守旧派对新事物的观念。

三 天津犯罪小团伙的特点

综合《益世报》多篇报道,笔者总结当时天津的犯罪小团伙活动主要有以下特点:

1 活动地域与作案目标有直接联系,较有针对性,且多跨区行动。如十大恶主要靠打劫车船为生,他们多在水陆要津活动,水路十大恶往往被称为水贼,陆路的十大恶有的伪装脚行抢劫行李,有的抢劫脚行物品。他们一般在抢劫后即移地活动,如上文提及之大李团伙就分别被擒于特别二区和特别三区。玫瑰党因为主要靠诱骗青年男女钱财为生,所以其以法租界华中路白玫瑰理发所为活动机关,而活动区域“大抵以剧场、影院、球社为最多,杂耍场、商场次之”。^[13]摩登破坏团则专在“摩登人士”聚集的影院活动。

2 犯罪团伙与其他社会势力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天津行政“多轨异质”的特征以及行政区划更迭频仍,造成不同机关之间利益的冲突,多个行政体制的并存使得这种冲突很难通过政府协调来解决。多轨异质为苏智良教授概括旧上海行政之特点,就

天津而言这种特点更为明确(多轨指的是在同一时期同一区域的社会内,并存着多种行政体制、法律制度和行为规范的不同社区,这些互相独立的社区各自沿着自己的轨道向前发展。异质则是指在同一时期同一区域的社会内,同时存在着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社会形态,它们之间是互相对立的)。^[16]在利益冲突过程中,甚至有的机关为了捞取好处而借重犯罪团伙之手。如姚瞎子十大恶团伙即与河北省船会相勾结,威吓天津市船分会船户。甚至“勾结水贼,胆敢深夜登船,形同抢夺,并唆使分会会员,退出会外,及种种不法行为。”^[10]可见,姚瞎子团伙的活动,体现了河北省船会与天津市船分会的利益之争。由于有了河北省船会的撑腰,姚瞎子团伙虽经天津市船分会“函请各机关严辑……该十大恶仍行猖獗,明目张胆抢劫,不稍敛迹。”^[17]此外,犯罪团伙为了作案方便,也积极向其他阶层渗透,如玫瑰党主要在戏院等处诱人上当,一些伶人也卷入其中,如玫瑰党“已获五人,其中并有伶人武生小吕布(即王胜虎)等。”^[13]

3 天津的犯罪团伙不仅仅出于经济目的,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冲突也会导致犯罪团伙的出现。而同样是五方杂处、土洋并存的上海类似的针对外洋新风尚和时髦事物的犯罪活动则很少发生。这与天津市民结构有很大关系,一方面作为被多国瓜分的租界所在城市,以及漕运中心的地理特征使得天津人好赶时髦。另一方面,天津近处封建王朝的京畿重地,其虽然不像北京那样深受“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但是毕竟比上海更能受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而且天津还是许多清王朝及北洋政府遗老遗少的退隐之所,这样就更使得一部分天津人好追逐时髦,而另一部分天津人仍抱有旧的传统观念,当双方共处一市之内时便容易发生激烈的碰撞,摩登破坏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的。与之相比,上海几乎没有发生类似的大规模事件,而与比天津传统观念更为浓烈的北京相比,摩登破坏团的活动“尚未有平市之多”。^[15]

综上所述,广布于旧中国城市内的租界,破坏了中国城市的司法行政完整,使得一市之内形成“多轨异质”的特征。近代城市的“多轨异质”特征不仅表现在城市的行政结构上,在社会结构上亦是如此。一方面社会贫富分化十分悬殊,另一方面“衣难蔽体,食难一饱”的贫困群体亦是来源广泛,其中有从农村流入城市的流民,也有城市中自身析出的

失业者。这些无业或生活陷入困境者都是犯罪团伙的主要来源,但是受其出身影响,其作案手段也各有特色,这就是同为犯罪团伙,但是十大恶、摩登破坏团及玫瑰党作案手段各异的重要原因。不仅经济上的失衡会成为城市中犯罪团伙涌现的缘起,特定条件下文化观念的冲突也会导致类似情况的发生。如天津摩登破坏团之活动,即是天津市内守旧派人士对那些“好赶时髦”的同乡的侵犯。由文化观念而引起的犯罪活动使得天津的犯罪团伙与其他大城市相比,在存在共性的同时,又有了一定的天津特色。

参考文献:

[1]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天津简史[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7

[2] 杨志垣, 等. 我们的家园·天津[M].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1998 28

[3]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 天津通志·附志·租界[M].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4] 储仁逊. 城市史研究[M].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112

[5] 林 希. 天津人[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7.

[6] 周俊旗. 民国天津社会史[M].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284

[7] 曹莉萍. 天津商人与清末民初社会习俗变迁[J]. 社会科学辑刊, 2004(3).

[8] 公安局侦缉队取缔十大恶[N]. 益世报, 1934- 10- 22 (5).

[9] 特三区 捕获十大恶首领[N]. 益世报, 1930- 05- 31 (10).

[10] 十大恶威吓船员[N]. 益世报, 1929- 03- 22(10).

[11] 假借名义勒索船户[N]. 益世报, 1929- 09- 03(11).

[12] 十大恶暴行之一般[N]. 益世报, 1930- 06- 02(10).

[13] 津门发现玫瑰党[N]. 益世报, 1934- 03- 21(5).

[14] 摩登破坏团出现于本市[N]. 益世报, 1934- 04- 06 (5).

[15] 本市发现摩登破坏团后 五项破坏主义[N]. 益世报, 1934- 04- 10(5).

[16] 苏智良, 陈丽菲. 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30

[17] 十大恶仍甚猖獗[N]. 益世报, 1929- 03- 28(11).

(责任编辑: 骆晓会)

(上接第 85 页)

对人的改造,使人不断得到发展。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也有着同样的诉求,只不过他们认为国民性改造的“主人翁应当是群众,而不是个人”,“它的倾向应当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7]在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们对人的发展的思考甚至还带有从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那里接受的很多理论观点和词语。如在 1921 年 8 月毛泽东在长沙创立湖南自修大学时,强调自修大学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同时他宣布自修大学的宗旨是“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因流于社会”;^[8]要求“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9]在这里,我们既可以看到与毛泽东在当年组织新民学会时相同的思想,如“适合人性”、“发明真理,造就人才”、“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涤不良的习惯”等,同时也可以看出他把人性的改造和发展与社会的改造结合得更加紧密。其实,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始终都关注对国民性和人性的改造,即使在建国后,他思想中改造国民性和人性的痕迹还清晰可见。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23

[2] 杜维明. 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 445.

[3] 李 贽. 四书评[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275

[4] 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70

[5] 郭齐勇. 儒释道的人生智慧[EB/OL]. Confucius2000(21 世纪孔子)[2002- 02- 20] <http://www.confucius2000.com/poetry/rshddrshzh.htm>.

[6] 中央档案馆, 中国革命博物馆,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编. 恽代英日记[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 530

[7] 蒋光慈. 关于革命文学[C]//当代中国文艺论集. 上海: 上海书店(影印本), 1996

[8] 李 锐. 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335

[9] 毛泽东. 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M]//中国书院史资料: 下册.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2590- 2592

(责任编辑: 卫 华)